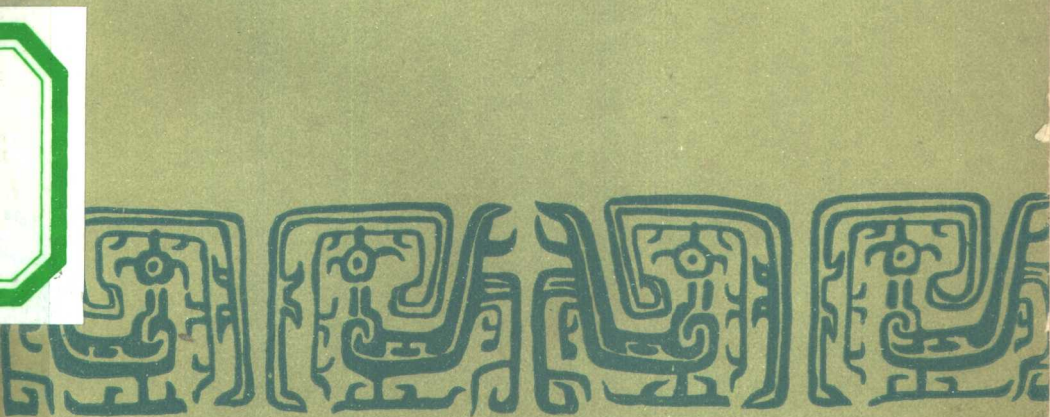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散文 研究論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編



中国古典散文研究论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034 字数 114,000 开本 850×1168 精 $\frac{1}{32}$ 印张 $5\frac{3}{16}$ 插页 2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200 册

定价 (4) 0.54 元

出版說明

为了把中国古典文学部門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加以集中，以便于讀者和研究者的閱讀参考，我社在 1956 年出版了《楚辞》等六种研究論文集，1958 年初，又繼續編輯了《詩經》等六种研究論文集。全国大跃进后，我們集中全力出重点書，这一批属于資料性的論文集，延至今日才与讀者見面。

当时我們对論文的收輯，范围很寬，而且为了“忠实于历史”，“不作任何論点上的、原則上的修改”，仅仅是为了反映那一个阶段社会上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实况。

經過厚古薄今批判后，社会上又展开了对資產階級的学术思想的批判，声势极为浩大，新生力量蓬勃出現，这是很好的現象。但学术思想必須有批判，也有反批判，“玉石愈攻而愈晶，真理愈辯而愈明”，学术思想不經過反复的爭鳴，是不会得到坚实的結論的。收在这里的論文，在我們看来，其中有确有研究和独创見解的，也有論点成为問題、可以大大展开討論的；但我們还是把它出版了：一方面是讓我們从过去的脚印上来看出今后发展的道路；另方面也希望引起学术界作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使我們的学术，得以再提高一步。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9 年 1 月 19 日

0711-4/52
04

目 录

略說“左传”創造人物形象的艺术	陈 詠 (1)
略談“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	譚家健 (10)
“战国策”簡論	潘 辰 (33)
試論“战国策”的作者問題	潘 辰 (44)
“試論‘战国策’的作者問題”商榷	罗根澤 (50)
司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侯外廬 (57)
司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傳記的	季鎮淮 (65)
“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	郭沫若 (76)
讀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后	王达津 (81)
关于司馬迁之死	郭沫若 (86)
“洛阳伽兰記”的現實意义	黃公渚 (89)
論韓愈	陈寅恪 (110)
論韓愈和柳宗元的散文	任訪秋 (121)
柳宗元的生活體驗及其山水記	(日本)清水茂 华 山 譯 (138)

略說“左传”創造人物形象的艺术

陈 詠

我国先秦史学典籍“左传”，它的艺术特征与艺术成就早为后人認識到了；晋朝范宁称“左传”一書的特征是“艳而富”，就指出此書的美学意义；刘知几在他的杰作“史通”中也对“左传”的艺术成就作过估計，他多次地談到“左传”的写作艺术，并給予很高的評價。

“左传”的艺术成就确实是不容忽視的，它不单創作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結構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語言，而且描繪了一系列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刻划了人物的复杂具体的精神面貌；不論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作者以他艺术的天才都把这些人物写得十分生动。先秦的文学著作也頗不少，但以創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艺术成就來說，我們还不能找出能与“左传”相比的著作来。

“左传”一書中許多人物都被写得具有各自独特的面貌，分明的个性，很少有性格模糊或性格彼此类似的艺术缺陷。

郑庄公和楚平王(公子弃疾)都是为了达到謀取君位的目的用阴謀手段来除去自己兄弟的人，但郑庄公有一副伪善伪孝的面目，楚平王却是个乘机盜用公众的名义，造成紧张恐怖的气氛来恐吓兄弟，逼得公子黑肱等自尽的阴謀家。晉灵公和卫庄公蒯聩都是暴君，可是前者野蛮得象一头原始森林中的野兽，后者則是个又貪得无厌又胆怯怕死的懦夫。又如被执政大臣驅逐而出亡国外的卫献公与魯昭公，性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卫献公驕傲无

礼，魯昭公則軟弱无主見又死愛面子。至于“左传”一書中一些有名的卿大夫，作者也写出了他們各各不同的个性：齐国的晏嬰始終保持自己的立場不肯插足到國內篡夺权势的斗争中去，且善于言辯应付；而郑国子产則是個喜欢大刀闊斧地改革內政、抗拒強国侵略的政治家，他英明果敢，鋒芒毕露。說到廢齐君的陳成子和逐魯昭公的季平子也是具有自己独特性格的人：陳成子有胆略而且手段狠辣，而季平子則虛偽圓活，行賄拉攏，活象个投机商人。此外如老于世故、謹慎少言的楚国申叔豫、卖弄才能、多言招怨的魯国臧紇，沉着多智的軍事家曹刿，勇而无謀的宋将华元，以及好酒昏庸的郑国伯有，楚国的伪君子申公巫臣，都是个性显明的人物。

假如我們認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認為“艺术家力求达到的主要东西就是創造这样一个鮮明的个性化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又体现着某一类人的共同的特征”認為“典型化是同創造个别性格能力分不开的”[●]，那末，我們就應該注意到：“左传”既然写出了不少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那也就必然是創造了不少的艺术典型；这就是說“左传”艺术的个性化的力量，應該是艺术概括的一种独特的表現。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左传”中郑庄公的性格是冷酷无情，阴险伪善，但，这岂是郑庄公一个人是这样的呢？一切封建統治者甚至一切以剝削为生的人們还不都是这样么？我們从历史紀載中，从我們生活經歷中，都可以理解到这一点。所以，我們在肯定“左传”能創造个性分明的形象的同时，我們必須認識到“左传”能創造典型形象这一艺术成就。

“左传”創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是多样的，独創的和精采

● 引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55 年专論“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問題”一文的譯文。

的。

在創造人物形象时，“左传”作者曾采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不同性格，并且收到良好的效果。

自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四年的有关晋献公宠妾驪姬謀太子申生的文字中，驪姬的阴险毒辣与申生的忠厚孝道就成了显著的对照，以致驪姬更令人可恶，申生更令人可怜。又如桓公六年至十三年有关楚国的斗伯比与屈瑕莫敖二人的文字中，斗伯比的英明果断、有远见与莫敖的浅識浮躁成了絕好的对比；这二个軍事家的智与愚、能与庸，在相互对照之下就更突出了。再如在宣公二年赵盾弑其君夷皋的故事中，晋灵公以杀人为乐的残暴性格与赵盾以爱人为本的仁者性格也是很好的艺术对比。

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是人物性格的表现，同样的，反过来，情节也能成为“性格表现的手段；换言之，不仅是内容的因素，同样是形式的因素。”^①“左传”一書中有的篇章就用情节的增添与变换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隱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中，本来写至“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无相見也。’故事就可以結束了。可是，作者在文末又添上这么一个情节：郑伯听从穎考叔的話闕地及泉与姜氏在隧道中相見，母子和好：“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这一情节就表现了郑庄公性格的另一面：伪孝！同时，这个人物的工于心計的特点也就更为突出了。类似的情形也見于桓公五年郑庄公与周王交战的故事中。周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

① 引自叶果洛夫：“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問題”，新文艺出版社版。

以諸侯伐鄭，鄭伯御之。”一場交戰，“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故事也就可以結束了。可是文末作者又加上这么一个情节：“祝聃請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打傷了對方，却又去慰撫對方，鄭庄公虛偽透頂的面目就在这一情节中充分显现出来了。

又如魯國臧紇，他自恃高才多能，終于多言招怨見逐于魯國的卿大夫；“左傳”在襄公二十三年写他寄居齊國后，又增加这么一个有趣的情节：“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齊侯）与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動，不穴于寢廂，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后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齊侯）乃弗與田。”臧紇这个聰明又多言招怨的特征又在这个情节上重复表現，并且被加浓了。

“左傳”作者也能从人物与环境相冲突中去揭露人物的内心矛盾，使人物形象具有生动性与具体性。

齊國晏嬰在庄公因和崔杼爭棠姜而被杀之后，他所处的环境是很困难的：有人要求他尽忠殉君，而崔杼则要他附和他杀君夺政的行为，否則就会遭害；可是晏嬰既不同情荒淫的庄公之死，也不同意崔杼的行为，但却又不能不顧到君臣之誼，更不能貿然和崔杼正面冲突以遭其害；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晏嬰独特的性格就生动地表現出来了：

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

……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敢。

文見襄公二十五年

这里，晏婴的正直、多智、善言的性格，他的独立的见解与才能都是在他与环境冲突中生动地具体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个例子是庄公八年齐襄公见大豕一文。齐襄公与妹文姜通奸，令公子彭生杀妹夫鲁桓公于车中，后因鲁国的谴责又杀了公子彭生。这个淫恶之徒在庄公八年“游于姑棼，遂田于具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这突然遇到的事物就使这个犯罪者面临一种违逆他意愿的环境：“左传”作者就把齐襄公在这种境况下的复杂心理刻画得非常生动：

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

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履。

犯罪者心中的恐惧而外表上力作镇静，逞强，但终于遏止不住内心极端的恐慌，吓得从车上跌下来，这种内心的矛盾就是在与外界事物的冲突中生动地表现出来的。

“左传”作者还善于通过一二个细节描写来揭露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娶其妻。”文中的“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这一细节就表现了华父好色与存心不良。又如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这“染指于

鼎，尝之而出”的細节描写，就表现了公子宋心中的羞怒，反抗，以及弑灵公的动机，之后终于杀了灵公。再如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这一二細节的描述，就把陈灵公君臣的无耻面目暴露无遗。

“左传”通过細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它的生动性是其它历史著作所不能企及的。这里我們試举二个例子：

一 吳王闔廬与越国交战，因伤致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雪耻。“史記”的“伍子胥列传”中是这么写的：

闔廬病創，将死，謂太子夫差曰：“尔忘勾踐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

可是“左传”却有不同的写法：

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文見定公十四年

“左传”的細节内容与在文中的地位安排是与“史記”不同的，但“左传”通过这一細节，就能充分表现夫差那种主动的精神及日夜不忘复仇的坚强的意志，而“史記”因为写做是闔廬对兒子的叮嘱，因此就不能象“左传”那样把夫差复仇的殷切願望及坚强的意志妥善地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左传”就胜过“史記”。

二 魯国叔孙豹到国外去与晋、楚等国会盟。其时魯国执政季武子却去伐莒国，取了鄆的地方。莒人告于会，楚人因魯国瀆盟就請杀魯国的使者叔孙豹，后因晋国的赵孟說情才免于祸。叔孙豹回魯国后，季武子来訪見他，叔孙豹心中是怨恨季武子的，

可是他又是個顧大局的人，那時這個人物的內心，就有了複雜的鬥爭，這種複雜的心情“左傳”也是通過一二細節來表達的：

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叔孫）旦及日中不出。會天謂會臯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而不忍其內，焉用之？”臯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臯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昭公元年

同樣的事件，“國語”“魯語”篇中却是另一種寫法：

穆子（即叔孫豹）歸，武子（即季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于外而庇宗于內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為能乎？”乃出見之。

“國語”中寫的叔孫豹一段理論性的說白和“左傳”的“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這一細節作比較，拿表達人物複雜心情的效果來說，“左傳”就比“國語”寫得含蓄生動得多。

“左傳”通過細節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我們還可以舉出好多例子來，尤其是成公二年齊、晉交戰的故事中，齊國君臣的驕狂輕敵與晉國將帥的驍勇苦戰，都是用一二富于感染力的細節來表現的，而且寫得十分生動。（原文較長，這裡不抄引了。）

我們知道，人物的說白是人物思想感情與性格的表現，因此文學作品中寫好人物的說白也是創造人物形象、刻劃人物性格的一種重要手法。“左傳”一書中人物說白的語彙與語調常常能妥貼地表現人物的心情與性格，甚至連本來是一些枯燥無味的說教但一經作者的安排也就成為很好的表現人物性格的一種手段。例如成公二年楚國申公巫臣謀夏姬一文中的巫臣對楚王說

的一段話就是如此：“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罰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這一番話全是說教，可是當我們知道這番話完全是申公巫臣為了達到自己取得夏姬的目的而用來欺騙楚王的手段時，則這番話就突出地表現了申公巫臣這個偽君子的卑劣性格。又如哀公二年衛太子蒯聵助晉國趙孟和鄭軍作戰時所說的一篇禱辭也是枯燥無味的。“國語”一書中也載着這篇禱辭，可是不能引起讀者的興味。而“左傳”中，這篇禱辭放在“衛太子……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這一情節之後，這篇禱辭也就成為表現蒯聵懦弱怕死的一種手法了。●

關於創造人物形象，“左傳”還有它獨有的一種寫法，它不是通過正面寫人物的言行來塑造形象，而只是寫某一人物所布置、指揮的一些事情，從側面來表現這個人物的性格。

昭公十三年那篇紀楚國公子弃疾謀君位的文字就是一個絕妙的例子。公子弃疾和公子比、公子黑肱等人趕走了楚靈王，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弃疾為司馬。於是弃疾就進一步展開他的陰謀來除掉自己的兄弟以謀取君位。這節文字是這樣的：

觀衆謂子干（公子比）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即舟字）走而呼曰：

- 蒯聵禱辭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繩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見哀公二年）

“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国人杀君司马，将来矣！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火火焉，不可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

丙辰，弃疾即位。……葬子干于訾，实訾敖。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汭，乃取而葬之；以靖国人。

这里，作者没有正面写出公子弃疾的言語与动作，但通过对他布置的一連串事件的描述，从他的目的和手段中，公子弃疾这个阴谋家的形象依旧是可使人感触到的，讀者从这篇文字中同样能知道公子弃疾这个人物的性格。

这种創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也見于昭公十八年郑国子产和火灾作斗争的故事里。文章只写了子产所布置的一些官吏在火作时依照子产的指揮做好防备戒守的事，但通过这些事件，子产沉着果敢的性格也显现出来了。

以上所写的只是笔者一些零碎的体会，“左传”这部巨著在創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就决不止这一些。同时，“左传”創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就固然不能和后世一些文学名著如：“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相比，但，此書基本上成于紀元之前，而那时的人在創造人物形象上已有如此的成就，則他或他們的写作劳动与艺术天才也足以使我們重視和敬佩了。

附記：本文抄引的“左传”一書中的文例，皆根据商务印書館的国学基本丛書中“春秋左传詁”（洪亮吉編注）一書；文例中（ ）内的文字則是我补注进去的，原文中没有这些文字。

（原載 1956 年 12 月 16 日“光明日报”第 135 期“文学遺產”）

略談“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

譚 家 健

一位朋友刚看了这个题目，劈头就問我一个問題：散文概念你搞清楚沒有？

沒搞清楚——我老实地回答——而且，我觉得目前还有不少人也不太清楚。

魯迅杂文是不是文学？“庄”“孟”“左”“国”入不入文学史？不是很有分歧么？这些現象表明：大家对散文認識还很不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已影响到繼承散文遺產問題了。因此，依我看来，解决散文理論問題，实在是應該提到日程上来了。

最不清楚之处恐怕在于艺术特征。我国的散文有我們民族的許多特点，这必須具体分析，决不能生搬硬套。我这里就是想从一部作品出发，来管窺一下散文艺术特征問題。

那么，你認為“孟子”是典型的文学散文嗎？他又問。

它不是純粹文学作品，但是，有很大程度的文学性質。濫觴时期的作品，不可能以今天的标准去对待。但在事物原始简单阶段，却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出繁荣复杂时期所不易分辨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这种“特征”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

形象性是文学区别于科学的根本特征。但是，它在不同文

学形式中有不同表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其形象的特点各不相同，而议论散文、历史散文、抒情散文……也还互有差异。各种文学体式，都是以各自独异的形象化方法来反映生活的，因而也才形成他们的独立部门。对此均应作具体分析，决不能“一视同仁”，一律对待。

就拿人物形象来说，这是文学形象的中心。在小说戏剧里，是以描写某个或一些人物活动情节来构成作品整个形象体系的。至于诗歌则不尽然，抒情诗就可以没有情节，人物也只是作者自己，通过对他自己思想感情的直接剖解，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来反映生活。这种人物形象，在“离骚”中就是屈原，在“好！”里就是马雅可夫斯基。议论散文抒情散文的人物形象也有些类似抒情诗，例如“永州八记”中的柳宗元就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鲁迅杂文中他本人的形象也非常鲜明。同样，在“孟子”中，我觉得孟子也是一个最中心而且最生动的具体形象。

文学艺术的人物形象，不能是“时代的传声筒”，他应当是有血有肉有独特个性的“这一个”，孟子就是这样的。他虽然直接向我们讲述思想观点，但同时也向我们坦露自己的性格情感。使我们觉得，不是在听抽象说教，而象在和一个人活生生的人谈话。闭上眼睛，我们就能想象出他的形象来。明代郝敬在“读孟子”中说：“读其书，论其世，可想见其人。”“人品心术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更无回互诡譎之谈，行己与人，坦然宽平，虽嘲笑不苟，而亦无矫激违情。”虽然这些分析不十分切当，但可以说明，孟子有可感触的个性特征，乃是古今所共同肯定的。

孟子的具体性格完全表现在“孟子”七篇中。在他的游说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同于当时一般说客，不但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统治者的缺点，而且还敢于大胆地讽刺、鄙视，甚至责骂

他們。公开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梁襄王“不似人君”，罵“不仁哉！梁惠王也。”齊宣王擺架子，要孟子去見他，孟子硬不去，非要他來“就見”不可。對貴族也同樣，齊王寵臣王驩，孟子和同路三天，連話都不和他說，在公行子家里祝壽遇見他，別人都忙着去逢迎巴結他，孟子却睬都不睬。對當時所謂英雄、大丈夫也瞧不起，“吾不為管仲”，而且还罵公孫衍、張儀是“妾婦之道”。……

在和弟子及其他學者的言談中，也突出地表現了孟子的性格特征：嘻笑怒罵，感情畢露，高興則“喜而不寐”，氣極了竟破口罵人，如罵“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學者罵人固然不好，但這正好說明，“孟子”散文確切反映了生活真象，表現了人物本來面目，沒有干巴巴的只是說理。如果是純粹科學著作，則不可能這樣。

孟子的性格，我認為基本上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正值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姑從郭說），隨着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變化，思想意識上民主觀念逐漸抬頭，學術上展開了百家爭鳴。當時孟子就大胆地提出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卓論，敢于藐視神聖君權，罵桀紂是“一夫”，罵五伯及今之諸侯是罪人，罵大臣是民賊……這種思想，正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孟子的豪爽直率、潑辣大膽的個性，在孟文中鋒芒畢露、痛快淋漓的風格，都和這種思想有密切的聯系。

孟子有很大的抱負，他說過：“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可是理想不能實現，而他却不肯屈就，反而自恃道德仁義，以之驕傲于統治者。他引曾子的話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自己也說過：“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